前線

FRONTLINE

VOL 1
JAN 2013

Prologue

序

Text\ 蕭文超

《前線》，FRONTLINE，在牛津詞典裡的解釋源自軍事用語，意思指最接近敵人的前線。當然，你現在閱讀的並不是軍事刊物，而是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出版的攝影雜誌。作為傳媒工作者，我們也沒有敵人。這是一條隱形的「前線」，由板間房，公屋，豪宅，禮賓府，天安門，一直伸延至整個世界。我們站在普羅大眾面前，也站在政商權貴面前，不分貧富，只分對錯。面對任何壓力，我們始終如一，堅守在這一條線上。新版《前線》雜誌之名，由此而來。

攝影記者也許給人兩個很極端的印象，一是戰地記者，以為我們周遊列國，走過槍林彈雨，睡在坦克底下，寫著一封又一封家書；另一印象是「狗仔隊」，以為我們天天守候名人門前，經常看見明星，甚或專門拍攝藝人走光。我不能說這些全都是想像，只不過攝影記者有很多種，有戰地記者，有所謂「狗仔隊」，亦有娛樂記者，當然亦有普通的新聞記者。新聞攝影題材包羅萬有，上至天文，下至海洋，從精緻美食，到漫天烽火，片刻光影都在我們的鏡頭裡綻放，記在歷史，化作永恆。

其實早於1994年《前線》雜誌已經付印，內容包括報道行內消息、圖輯欣賞、攝影新知、攝影專欄、外國攝影師介紹，還有新聞道德的討論等。雜誌連續出版30多期，直至1998年，因人手和資金問題而停刊。受惠互聯網發展迅速，我們現在可以較低成本重新推出新版《前線》電子雜誌，並希望透過雜誌喚起各界人士對新聞攝影的重視。

隨著時代進步，《前線》當然不可以蕭規曹隨，除了重新設計版面，我們亦增加圖輯的版位、兩岸攝影師的專欄、攝影書籍推介，並定期訪問不同攝影師，介紹他們的作品。我們立足於新聞攝影，同時探討其他各式各樣的攝影類別，因為我們堅信新聞攝影有多種可能性，任何優秀的作品我們都希望刊登。

因此第一期復刊，我們專程訪問了荷賽（World Press Photo）獲獎攝影師Ed Ou，他會為我們分享拍攝理念和採訪經歷。同時，亦會刊登前新聞攝影記者楊德銘在印度拍攝的一輯作品，他利用不同人物構成一扎遊記，或貧或富，或憂或喜，沒有地標泰姬陵，也沒有Bollywood的明星，有的只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物。也許這輯圖片沒有沉重艱深的主旨和令人目眩的技術，但或許人的生活正是如此，平凡，但有生命。此外，我們亦刊登台灣《蘋果日報》的攝影記者杭大鵬的作品《我爸爸的最後幾天》，攝影師在病危的爸爸跟前，憶起許多童年往事，決定利用相機記錄爸爸生命中最後數天。攝影師透過鏡頭回望彼此一同走過的人生路。該輯作品真摯感人，亦提醒我們應該好好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光。

路透社攝影記者葉英傑(Bobby Yip)亦會為我們分享多年前一幀難忘的照片，而《蘋果日報》攝影記者何家達分享新聞攝影的曖昧，探討「本質的真實」還是「事實的真實」。《前線》特約記者何雪瑩則為我們整理2012年的新聞大事，並訪問了數名前線攝影記者，讓他們親述如何走過忙亂的一年。最後的就是將會為我們推介攝影集的自由攝影師岑允逸(Dustin Shum)，這次他會介紹歷史紀實和報導攝影雜誌。

現在，請各位讀者細心欣賞行家們的心血結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的雜誌，謝謝。

蕭文超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主席

Contents 目錄

焦點 Focus

專題 Feature

手心的黑色眼睛 - 何雪瑩

人物 Peo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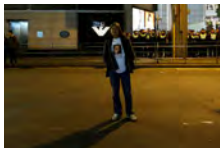
觀照中反覆自詰 Ed Ou - 何鳳儀

圖片故事 Photo Essay

印度初體驗 - 楊德銘

專欄 Column

杭大鵬 - 我爸爸的最後幾天
葉英傑 - 錯失時機遇上意外
Dustin - 油墨的味道，是臭的
何家達 - 記元旦遊行



《前線》雜誌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執委
特約記者: 何雪瑩、何鳳儀
設計: Anson Lam

執委名單
主席　蕭文超
副主席 林亦非
秘書　周穎瑤
司庫　羅國輝
委員　何家達
委員　羅君豪
委員　盧翊銘
委員　鄧宗弘
委員　梁百豪

陳新安教授向記者展示新裝修的中大醫學院解剖室，他讚歎新解剖床的氣孔可排走防腐氣味，頭頂的黃燈一開就令人溫暖。(梁百豪攝)

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就其大宅僭建展開的答問大會時，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向梁振英投擲物品。(汪志堅攝)

渠務署於2012年12月10日舉行海底排放管色素測試傳媒簡報會，測試期間海面上泛起大片綠色。(盧翊銘攝)

新加坡聖淘沙一水上樂園於2012年12月7日開幕，遊客可於水上樂園的水池內與珊瑚魚浮潛。(潘政祁攝)

保釣行動成員在日本駐港領事館外燃燒紙製示威物品，抗議日本首相參拜甲級戰犯。(莊振邦攝)

Text\ 何雪瑩 • Photo\ 王嘉豪、何柏基、Manson Wong、梁偉樂，高仲朋

手心的黑色眼睛

資訊太多，時間太少。科技改變了時間的長度，早上的新聞，經網絡傳播，下午已是舊聞。發生的事很多，知道的東西也多。記憶卻像手心上的沙子，捉不緊，留不住。

翻看舊報，整理2012年：反國民教育、689當選、南丫島海難、僭建門上下集、貪曾，茶餘飯後，嬉笑怒罵，扣人心弦。「我城」的說法也許有點彆扭和坐井觀天，拒絕將身份認同拓展至深圳河以北。誠如一位前輩所言，中共愈來愈為香港人的本土意識著急，愈發將心繫家國植入每個人腦中，香港人感覺愈疏離；他說港人對大陸的觀感有如遠房親戚，新一代尤甚，即便聲援李旺陽亦如是，沒有血脈相連的道德力量將香港和大陸綑綁在一起。也許，有一天，我們會覺得自己食緊花生。

開學禮的眼淚

有說反國民教育可能是一個時代的開始。那些年的夏天我們才剛開始練習往添馬艦的路。記得9月1日是個星期六，八萬人在臨海一片草地上徜徉。竟然因著反國民教育首個大型集會，我們才知道欣賞維港兩岸夜景，可以沒有自由行。

那天晚上Manson Wong就在前台，節目尾聲，差不多離開。一名早已認識的學民思潮成員上前跟他聊天。那時教協理事韓連山跟九名社運老將上台。原本打算動身離開的Manson跟「學民仔」八卦起來擠進攝影記者區。

「韓連山發言沒多久就開始流下老淚來。」「學民仔」問Manson借過他的相機拍了幾張，Manson見台上一眾人等也紛紛落淚，他請「學民仔」拍幾張，一看，但覺不是時候，才拿回相機，自己操刀。六十三歲的韓連山宣布絕食。

「當晚大家目標是迫政府立刻撤科，但政府一直沒有任何動靜，對參與運動的人其實很沮喪。當韓連山走出來宣布絕食，突然間覺得釋放，好似覺得雖然集會即將完結，起碼有人接力堅持下去，但同時間又覺得集會徒勞無功，達不到目的。」這一刻Manson留意到台另一面的黃之鋒和陳惜姿也哭了起來，連續按下快門，終於準確捕捉二人同時拭淚。這張照片在網上廣泛流傳。「後來有行家跟我說照片成功捕捉現場大家介乎沮喪和釋放之間的矛盾情緒。」

日本京都府北部小村落伊根的漁民出海捕魚。凜冽海風近面刮來，漁民在船中央架起火爐取暖。（王嘉豪攝）

「我把六顆骰子的四點一面朝上，放在充滿煙蒂烙印的垃圾桶上。不想把話説得太白。」（何柏基攝）

國民教育vs愛國體現

反國民教育慷慨激昂洋洋灑灑，LamaLeung獨愛韓連山的絕食照片，「這張照片見到堅毅。」那一刻韓連山已經第七天絕食，最後絕食共一百五十個小時。「絕食者比其他參加者更有感染力，當中韓連山年紀最大，卻堅持最耐。」

身為父親的Lama從反國民教育中喜見香港年輕人開始清醒。「以前經常批評年輕人政治冷感，但原來不是。」香港社會有時很矛盾，有人嫌年青人政治冷感不關心社會，近年愈來愈多新社會運動由年青人主導，卻總有一些人跳出來指點年青人太激進，諸多不滿，不應經常參與社會運動，用功讀書努力向上爬才是王道。Lama不以為然：「每一代人都如此看待下一代啦，都批評下一代太激進，正如我後生時都被上一代話。」

如果國民教育源於中央覺得港人不夠愛國，有學者説，二十四年前的春夏之交香港人真正首次明白「血濃於水」的意義，那是香港人愛國的強大體現。晃眼進入第二十四個年頭，除了每年維園重演「蠟炬成灰淚始乾」，我們每年都在詰問還能做點甚麼。

黃之鋒和陳惜姿在反國民教育大型集會舞台上哭了起來（Manson Wong攝）

六顆骰子的四點

去年六四前一星期，何柏基被活化廳幾位朋友邀請出席一頓便飯，席間認識一名北京人。言談間才知道他準備在活化廳展覽兩張從未公開的六四現場照片。

「原來當時北京朋友是解放軍，當天正在北京執勤。他的小隊頭目叫他放下槍桿拿起相機，他目睹所有事情，把相底保留至今。北京人現職畫家，曾把照片繪成畫卻嫌不夠徹底，決定把兩張照片公開展覽。」何柏基身為攝影記者，跟他評估辦展覽的風險。「我告訴他要有心理準備，他可能付出很大代價，照片卻沒有引起很大迴響。」北京朋友下了決心。

何柏基一直思考還能為六四做點甚麼。6月2日那天他往文具店買信封，見到骰子，靈光一閃順便買下。「我把六顆骰子的四點一面朝上，放在充滿煙蒂烙印的垃圾桶上。不想把話說得太白。」至於那名北京朋友，7月時他曾經打聽過，聽說他回內地時只有少許麻煩，被拘留數小時，之後情況如何便不得而知。

何柏基很直接說，對香港未來完全絕望。「2011年立法會搬遷前有個時間囊儀式，張文光將佢同民主女神像的合照放進去，活脱脱是個只會懷緬過去常陶醉的中坑，根本不似會為未來奮鬥。2012年就更躁。」

韓連山當時已經絕食第7天，最後絕食共150小時。(梁偉榮攝)

愈窮愈見鬼

躁的還有高仲明。去年他拍了劏房圖輯，「跟我十年前初入行比，情況更差。」劏房圖輯本來是工作，後來工餘時間他走訪大角咀、香港仔、深水埗、荃灣等區共二十間劏房。

「當我上到去時我跟一對新移民夫婦打招呼，請他們帶我入房，他們正在打機叫我不要影，也竟然不肯放下手上的遊戲機，著我要影就自己入房個夠。我推門進去，只有一名四歲小女孩，我想這對父母也真不負責任，任由我一個大男人跟小女孩獨處，完全沒有想過保護她。他們也不是那些廿歲不夠不懂事未婚生子的夫妻，兩個都四十幾歲人了。」

高仲明2000年入行。「那時我幻想劏房應該是濕漉漉臭氣薰天，但首次造訪先發現原來幾乾淨。今次影過月租4,000至8,000元的豪華劏房，就真係幾乾淨；但兩三千月租的環境真是極差，情況比2000年更差！」十二年來香港經濟由谷底反彈，樓價創新高，自由行成行成市，劏房環境卻愈來愈差。高仲明說，愈窮愈見鬼。「那位小妹妹，一出世就要接受命運，大規模改變根本無可能。」

一名4歲小女孩在劏房內拍照，她的父母則在外面打遊戲機。（高仲明攝）

風景美，人更好

2012年王嘉豪離開港聞攝影跑道，任職副刊攝影記者。「以往港聞日日通處跑，現在副刊工作模式上算是比較穩定，在外跑的時間少了，準備時間更多。」

「我到日本京都府北部丹後一帶的小村落伊根為旅遊版拍照。伊根有個小漁港，我打算跟漁民出海捕魚。那天早上4時我已登船整裝待發，天未亮，又黑又冷，漁民話不多，八人都穿上極厚的保護衣物，低著頭準備，沒多久就出發。凜冽海風迎面刮來，漁民在船中央架起火爐取暖。」

身為副刊記者，王嘉豪驛馬星動，遠近都有他的足印。風景美，人更好，值得記下的事太多。「從他們身上我看見對工作的尊重和態度。大浪在拍打，船在起伏間落差極大，　他們卻滿有鬥志，火光映在他們堅毅的臉上，照出不同故事。即使曾有船員的兒子命喪大海，即使風高浪急從未知曉。這是我這一年以來看過最美麗的畫面。」

顧城說：「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他來尋找光明。」攝影記者拿在手心的眼睛，都是黑色。

Text\ 何鳳儀 • Photo\ 林亦非 • 受訪者提供

觀照中反覆自詰 - ED OU

二十六歲，在香港，許多這個年紀的人還在摸索，躊躇是否應該轉工，盤算如何買樓以及償還那筆隨之附送的二十年物業貸款債。

二十六歲，Ed Ou卻早已拿走新聞攝影最高榮譽的World Press Photo獎項，體現人生的另一個模式。

理論上與拍拖六年的以色列女友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同居，實情是一年返去不夠十次，餘下日子都因工作往不同地方跑，寄住朋友家中，或者索性睡在巴士站。右手戴著兩枚卡通織布腕帶錶，一隻是美國紐約時間，一隻是當地時間；左手前臂內側以黑色箱頭筆寫下的一串數字，是他當時的手機號碼。每次抵達新地方，首先買張可供上網的電話卡，電話號碼就是用這個最可靠的方法記在身上，不會丟失。

這樣寫完又洗、擦掉了又寫上新的，銘刻著Ed Ou在以色列、黎巴嫩、索馬里、也門、哈薩克斯坦、埃及、利比亞、烏干達、加沙地帶和香港的遊歷。

在Facebook見到Ed Ou透露自己到香港，冒昧給他發一個 inbox message，邀請他接受訪問。

不消十分鐘，Ed Ou回覆寫道：「Hey sure that would be cool. Feel free to get in touch anytime. Let me know what your plans are.」

快人快語。

這天清晨五點鐘，特地起了個大早，和Ed Ou約好要到天水圍的天光墟走走。汽車穿越紅隧再在屯門公路上飛馳，Ed Ou拿著iPhone 5開著Google Maps，透過手機地圖定位比對窗外風光，是他探索城市地理的方法。

寒冬的黎明時分，我忍著呵欠下車，緊緊頸巾雙手插袋前行，Ed Ou卻依然踏著那對招牌涼鞋。我問，腳趾不會太冷嗎？「當然不會！」然後他裝起懊惱的表情咆哮兩聲：「穿鞋對我來説就像坐牢！」倒是2012年9月初到曠廢的加沙地帶一役，編輯説穿涼鞋的話保險會不受理，他才乖乖穿鞋上陣。有網友看完紀錄片《War Photographer》，寫James Natchwey出發前會狠狠把鞋帶扯緊綁好；那我唯有寫Ed Ou那雙涼鞋用魔術貼穩固而方便，褲管過長，往上摺短尚不夠，他會再用長尾夾夾得妥當。

清晨時分，Ed Ou在天水圍天光墟拍攝。（林亦非攝）

Text\ 何鳳儀 • Photo\ 林亦非、受訪者提供

「沒有數碼相機，我不會走進攝影」

遊走在天橋兩旁十多檔地攤之間，Ed Ou 單眼皮下雙目靈動，貪婪好奇地搜索有趣的事物。大學主修國際政治學，Ed Ou 從未接受過專業攝影培訓，他靦腆地說：「若沒有數碼相機，相信我不會走進攝影。」但他自有一套鑽研攝影的方法：「我入行時已是通訊社攝影記者，有幸與其他通訊社的前輩一同到現場拍攝；三小時過後，我會上網看看各通訊社發出來的相片，就會知道同一個時刻，其他人在看甚麼，自己看漏了甚麼，然後就會知道哪一張較好。」

Ed Ou 說，今時今日做攝影記者，攝影是最容易掌握的部分，影好相的關鍵在於你去得到那個地方、你逗留多久、你看事物的方法，並且投資時間去了解當地的政治、宗教、語言和不同文化。

四名索馬里男子為偷渡到也門，熬夜趕路，疲累得倒下昏睡過去。（Ed Ou/ Reportage by Getty Images）

Text\ 何鳳儀 • Photo\ 林亦非、受訪者提供

先是人，然後才是新聞人

同樣地，Ed Ou沒有讀過新聞學，那套講究中立客觀的新聞原則他似懂非懂。每到一個地方，他最喜歡與年紀相若的當地年青人混在一起，例如他鏡頭下的2011年埃及開羅解放廣場，除了投擲燃燒彈的衝突片段，還有年青示威者團團圍著為iPhone和MacBook充電的場面。但這樣難道不怕墮進不客觀、不中立的陷阱嗎？「記者當然要客觀和不偏不倚，但與此同時，要拍出感染力強的照片，必先取得對方的信任，而要別人信任自己，你要先是人。客觀不等於要把人性抽去，而是抱有與普通人一樣的同理心。」他續稱：「然而，身處兩方衝突交鋒之時，尤其在中東，當你看到陌生人在你身旁倒下死去，若給人發現你面露一絲憐憫，就可能被人以為你靠邊站，予人襲擊的口實。所以，有時只好不情願地拒絕提供協助。」

「既然我們無法做到事事中立，那麼最要保持中立的，就是如同普通人一樣同哀、同怒、同喜，不帶既定立場地把眼見的事物報道出來。」

Ed Ou是天生的演說能手，談起這套自己在親身到現場闖蕩採訪間悟出的新聞理論時滔滔不絕，說完就確實地呼一口氣把劉海吹得揚一揚起。在形而上的理論課來回幾轉後，我把話題帶到讓他奪得World Press Photo的作品《Escape from Somalia》。

四十五名索馬里人，窩藏在一艘不足十米長的爛漁船裡，向也門進發。（Ed Ou/ Reportage by Getty Images）

Text\ 何鳳儀・Photo\ 林亦非、受訪者提供

逃離索馬里

索馬里這個東非國家一直是 Ed Ou 的攝影對象，2006 年他出道時，就記錄過索馬里內戰史上，武裝組織聯合伊斯蘭法庭被過渡政府瓦解的一段。但他的目光沒有因為當日傳完相就離開索馬里。他說：「每次拍攝，我都掏空全副心思放進去，也永遠無法知道，手上的故事是否真正完結。我會重返四、五年前走過的路，再訪當年接觸過的人，從而知道事情起了甚麼變化。」

2010 年 3 月，Ed Ou 再次踏足索馬里。長久內戰致社會體制崩潰，不少索馬里人為逃離衝突和貧困拚命一博，橫渡亞丁灣（Gulf of Aden），寄望偷渡到彼岸的也門。單以 2010 年上半年，就有六千多名索馬里人抵達也門；但沒有機會到達也門的不計其數，就在波瀾跌宕的亞丁灣遭海盜擄劫，又或者乘坐的木船遇上風浪卻無人知曉。Ed Ou 就是隨索馬里偷渡客一同經歷這段旅程。

偷渡並非只是走到碼頭上船那麼簡單。那晚下著細雨，在連綿無垠的土地上趕路，Ed Ou 抱著相機，同行是決意闊別出生地的四名男子，泥濘讓步履變得更沉重，卻不能停下。熬夜趕路，顛簸，跋涉，從黑夜走到白晝，終於，腳下是乾裂而實在的土地，苦澀的汗水滲進雙眼，累極了，眾人倒下便崩潰昏睡過去。Ed Ou 也不例外，但倒下那刻想起要拍照，怠倦中費盡全力提高雙手把相機舉起，咔嚓，為四人在曠野展現的堅毅留下見證。

成功闖進接壤的另一東非國家吉布堤（Djibouti），Ed Ou與其餘四十五人，窩藏在一艘不足十米長的爛漁船裡，向也門進發。天地蒼茫，時間在和著冷汗與燃油氣味的空氣裡流轉，煙月映照下，他們眼眸深處不是對新生活的冀盼，而是惶恐不安，擔心命喪大海，害怕被截獲而要回到家鄉淪為蹲苦牢的囚犯。旁人視之如玩命的拍攝項目，原來不是靠盲動衝撞完成。Ed Ou說：「每次出發之前，都要想清楚所有出錯的可能，想象每走一步的情景，設定好出錯了要怎樣應對。拍攝有時也是團隊工作，這次旅程當中，我雖然無法與其他人通電話，但一直以短訊與編輯保持聯絡，也帶了GPS導航器在身，倘若遇上沉船意外，就會按鍵通知公司求救。」沒有沉船，沒有海盜，但也沒有靠到也門海岸。漁船引擎壞了，漂泊回到吉布堤擱淺，Ed Ou與同船的索馬里人被捕。經公司和領事館協助，Ed Ou被羈押五天後獲釋。這輯照片為他帶來2011 World Press Photo當代議題故事組冠軍的殊榮，奠定年青的他在新聞攝影壇的重要地位。

索馬里人乘漁船偷渡，惟漁船引擎壞了，最終漂泊回到吉布堤擱淺。（Ed Ou/ Reportage by Getty Images）

Text\ 何鳳儀 • Photo\ 林亦非、受訪者提供

前蘇聯於冷戰期間測試核武，Ed Ou於2008年到哈薩克斯坦，記錄核試後遺。（Ed Ou/ Reportage by Getty Images）

讓人注視索馬里，一天也好

雖然逃離索馬里的偷渡旅程並沒有以抵達也門作為終結，但 Ed Ou 在途中發現有小孩手持軍槍巡邏，默默記在心上，一個月後又再到索馬里。2010 年 6 月 13 日，Ed Ou 就索馬里童兵的偵查報道刊於《紐約時報》的頭版，隨即惹來軒然大波。美國與索馬里過渡政府關係友好，當美國人看到報道、知道自己交的稅有部分是落入這個招募童兵的政府口袋裡後，憤怒得紛紛電郵予議員。有參議員在翌日國會上展示 Ed Ou 的作品，看到相片裡兩名男孩拿著與一臉稚氣不相稱的長槍待命，任誰也動容。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其後也向索馬里過渡政府施壓，要求停用童兵。沒有拯救世界的本領，但 Ed Ou 相信：「能夠讓別人注視索馬里，一天也好。」

Text\ 何鳳儀・Photo\ 林亦非、受訪者提供

「我在對的位置嗎？」

自言被攝影弄得有點精神分裂的 Ed Ou，完成拍攝項目翌日就會混身不自在，每天都要問自己：

「我在對的位置嗎？」
「我採訪的人對嗎？」
「我找的故事對嗎？」

思考，本來就是對話。自我分裂，自我詰問，這連串問題如夢魘一樣揮之不去，Ed Ou 不時困惑和掙扎，往返於肯定和懷疑之間，他說：「做記者要不斷自我質疑，不安全感可讓我繼續尋找最佳的拍攝位置。」Ed Ou 認為，記者必須是關心社會的公民，把值得關注的事理智地翻譯成相片、錄象、文字，向世界展示，引起別人的興趣和討論，然後，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2011年，年青示威者在埃及開羅解放廣場團團圍著為iPhone和MacBook充電。（Ed Ou/ Reportage by Getty Images）

Text\ 何鳳儀 • Photo\ 林亦非、受訪者提供

Ed Ou 小檔案

1986年：生於台灣。

1987年：舉家遷往加拿大溫哥華。

2006年：大學時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修讀國際政治學，期間為美聯社和路透社拍攝，曾採訪以色列黎巴嫩衝突、索馬里內戰等。

2008年：獲Photo District News選為三十名新晉攝影師之一。

2010年：《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他的索馬里童兵照片，翌日有美國參議員於國會上展示該相片，聯合國對索馬里招募童兵情況表示關注。
隨索馬里難民乘船偷渡往也門，作品奪得2011 World Press Photo當代議題故事組冠軍。

2011年：主要採訪阿拉伯之春，足跡遍及埃及和利比亞等地。

2012年：採訪加沙地帶流血衝突。現為Reportage by Getty Images的攝影師，主要為《紐約時報》拍攝。

勿做編輯的奴隸

讓世界變得更美好，似乎是每個新聞從業員入行時多少有過的憧憬，但日子久了，那些理想和現實的衝突矛盾就像按劇情發展般一一湧現，忽而困於想不到拍攝題目的迴圈，忽而有感懷才不遇而自怨自艾。Ed Ou 坦言他一樣要生活要交租，無奈最感興趣的題目往往並不賺錢，因此他會靠拍攝任務賺得的收入，來支持他認為值得報道的拍攝項目。

那麼，攝影記者有何生存之道？「關鍵是勿做編輯的奴隸。」Ed Ou 說：「等待別人指示或批准才去行動是最大錯誤。」

長年在危險地帶採訪，今天擺在眼前的是仇恨和卑劣，但翌日遇見的卻是萍水相逢的人如何犧牲互助，又再喚起 Ed Ou 對美好世界熱切的嚮往。「即使是香港這樣濃縮的城市，也有太多事情等待記者報道。提出的題目總不會立即得到編輯青睞，故此最重要還是依循你的興趣去拍，拍一些你想以記者身份探討的題目。互聯網出現後，再不用飛到紐約去拜會編輯，只要是好相，總有面世的機會。你現在要做的，就是拍攝。」

「再者，你的相片、文字刊出了，還有主人翁的苦難尚未止息。」拒絕心死，拒絕安逸，這是 Ed Ou 繼續攝影的動力。

後 記

認識EdOu後，才知道這個古怪名字一點也不怪。他的父母是道地台灣人，Ou是姓氏。黃皮膚黑頭髮的EdOu，未足一歲就赴加拿大生活，普通話説得生硬，最流利的兩句「我不需要很多錢」、「錢夠用就行了」，是初入行時與父母吵架的對白。EdOu説，父母愈來愈支持他的工作，有時看完《紐約時報》，提醒孻子萬事小心，而其實那篇就是EdOu的報道。

EdOu的媽媽嗜吃台灣水果蓮霧，曾把蓮霧種子換進碎粉盒內，由年紀小小的EdOu負責從台灣護送到加拿大。但加拿大的天氣太冷，總是收成不好。

十五歲那年，台灣的一隻蟑螂偷偷走進EdOu父親的行李篋裡，遠渡橫過太平洋飛到加拿大。EdOu一家原本只是召滅蟲專家，豈料當局認定那是侵略性害蟲，把他們一家人迫遷到酒店，大宅遭人封鎖大消毒。

EdOu愛拍為了各種理由遷徙的異鄉人，來到香港，想了解內地人、南亞裔人和菲傭的生活。周日下午，他在深水埗一公園遇到外籍女傭聚會，用iPhone5捕捉了她們一同舉手閉目禱告的情形，放上Instagram，有五十三個Likes。

至於再前面的，是EdOu跟我們分享的蓮霧和蟑螂也移民的故事。

圖片故事

Text\ 楊德銘 • Photo\ 楊德銘

印度初體驗

印度一直是我很想體驗的地方，早已聽聞過各種關於印度的名詞和形容詞：泰姬陵、恒河、咖喱、Sari、種姓制度、印度教、貧富懸殊、恐怖襲擊、牛、蒸餾水、骯髒、性騷擾、Bollywood、甘地、德蘭修女、少年Pi、濕婆神。今次出席在倫敦認識的印度女同學婚禮，更是一次難得的經驗。在四天奢華的新德里婚宴和慶典過後，迎來的是約一星期的自助旅遊，從新德里(New Delhi)出發，先後坐通宵火車和私家車經過阿格拉(Agra)、瓦拉納西(Varanasi)及恒河，再到齋浦爾(Jaipur)和焦特布爾(Jodhpur)。在各種豐富色彩和奇幻宗教的奪目後，是一輪人情冷暖、貧富懸殊和衛生參差的洗禮，這幾乎是旅行印度的必然經歷。

回來香港不久，印度發生女大學生在巴士被強姦致死的案件，引來全國的嘩然和憤怒抗議。在短短的十多天旅行，我們沒看到或感受到四周的女性受到歧視和欺辱，但當然問題其實存在已久，而且有上升的趨勢。當地傳媒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 在去年11月做了問卷調查，訪問了多個邦的男性（約六成來自鄉郊）對女性的睇法。其中一些答案和數字實在讓人驚訝，例如在北部的哈里亞納邦，58% 的男士認為身體虐待女性是婚姻的一部份；又例如67% 的哈里亞納邦男性認為，女士跟男士飲酒和食煙是缺乏道德。

圖片故事

Text\ 楊德銘 • Photo\ 楊德銘

RJ19 SU 7234

Photo Essay

圖片故事

Text\ 楊德銘 • Photo\ 楊德銘

圖片故事

Text\ 楊德銘 • Photo\ 楊德銘

Text\ 楊德銘 • Photo\ 楊德銘

Photo Essay

圖片故事 | Text\ 楊德銘 • Photo\ 楊德銘

無論如何，我們也應繼續關注印度女性的生存狀態，以及各種貪污和貧富懸殊等問題。這十多張照片，並沒有特別專注某個題材，只屬於我在印度旅行中的所見所聞。沒有大道理，只有偶遇的小人物和卑微生活。

Text\ 杭大鵬 • Photo\ 杭大鵬

杭大鵬
台灣基隆人

1969年生，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大學時開始接觸攝影，1993年開始攝影記者工作，曾任職自立早報、自立晚報、勁報，目前是台灣蘋果日報攝影中心攝影記者。

我爸爸的最後幾天

2002年9月，我的父親離開了人世。

在醫院裡陪伴他的最後幾天，看著他病情逐漸惡化，意識日漸模糊，我才發現以攝影為職業的我，居然沒有好好的幫自己爸爸拍張照。隨手用著包包裡的定焦小相機與幾卷底片，記錄爸爸最後的身影，也思索著生命的歷程，回憶著父親陪伴下的成長過程。

有人說，攝影記者是「旁觀他人痛苦」的工作，這組照片算是一段審視自我哀傷的過程。每按下一次快門，心裡的情緒都在糾結與翻騰，紀錄下的不止是我爸爸的最後幾天，更是那段日子的內心情感吧。

一天早上，我的媽媽打電話給我，老爸昨晚昏迷意識不清送醫院急診，要我回家一趟，趕回老家時爸爸已經從急診轉到病房，等待進一步的檢查。老爸時而昏迷，時而自言自語，沒法溝通。病房窗外的陽光照了進來，看著自己的影子與床上昏迷的老爸，孩子都是在父母的影子下長大的，這點直到我生了女兒當了爸爸後才明白。

父親晚年有腎臟病，每週有三天要到醫院洗腎。那三天通常都是我去醫院接我爸回家。洗完腎後我都要用雙手幫我爸按著手臂上的針孔止血，那十分鐘的時間，通常是父子四目相望，相視無言……

爸爸的手與腳會不自主的噪動，有時還會拔掉身上的管子，醫護人員只好用固定帶綁住。我與父親間的話不多，當他昏迷後，反而是最想與他說話的時候。

半夜在病床旁陪伴，老爸不停地自言自語地說夢話「奶奶，好久不見……」「我要逃啊……不行啊……我要走啊……娘啊……」聽著他反覆地講著這些夢話，我才真的理解，1949年在上海逃命上船的那一刻，是他一生無法平復的傷痛。

加護病房一天僅有兩個探病時段，病情沒起色，讓人有不祥的感覺。

Text\ 杭大鵬 • Photo\ 杭大鵬

自主呼吸不順，加護病房幫老爸接呼叫器。醫生說，敗血情況不佳，要我們有心理準備，家裡的後事也要安排一下。或許是爸爸病了好幾年，聽到醫生這樣講，感覺情緒上沒有太激動，該來的終究還是來了，來了也只能面對。在家裡收拾東西，才發現沒有照片可以當遺照。趕緊找了有暗房工作室的朋友，幫忙放相與裝框。

最後的一晚，家人們在加護病房內陪伴著老爸。看著心電圖的跳動與聽著機器的嗶嗶聲，心裡一片茫然，原來這兩樣就代表了生命。心電圖的機器突然發出了一長音，曲線變成了一直線，生命在此刻消逝……

老媽雙手合什地對老爸說：「你安心走吧……」

2002年9月13日星期五上午5點46分，一個黑色星期五的清晨，父親的一生在此停格了。

專欄

Text\ 杭大鵬 • Photo\ 杭大鵬

蓋上往生被的老爸。我一直告訴自己不要哭，看到著一幕，我還是流下淚來。

Text\ 杭大鵬 • Photo\ 杭大鵬

載著爸爸大體的車子從醫院地下室開往殯儀館，死亡是走向光明還是走向幽谷。

殯儀館的工作人員把大體送進冰櫃，想起我爸之前說，冰櫃不要放太久，因為他怕冷……

弟弟捧著牌位，我開著車送老爸回家，爸爸以前喜歡我開著車載他出去走走，順道四處吃吃飯，這是老爸最後一次坐我的車了。

捧著爸爸的牌位回家，「爸，進門到家了……」。法師與葬儀社在客廳佈置好靈堂，很難想像上個星期，老爸還在屋裡走來走去的。

Text\ 杭大鵬 • Photo\ 杭大鵬

一歲多的女兒回來看爺爺，拿了一塊餅乾要給爺爺吃。

爸爸的後事生前沒有安排，只說不用落葉歸根回老家了，
那幾天四處幫爸爸看塔位找個家。

Text\ 杭大鵬 • Photo\ 杭大鵬

看著其他喪家的孝女送葬隊伍，覺得關於親人離去這件事，為甚麼一定要用誇張的情緒表達方式。

爸爸大體火化時，也燒些衣物與紙錢給他。

父親過世後四年，我的小兒子出生了，家族的生命長河裡，有離開的也有新生的，2011年清明節帶著五歲的兒子去掃墓幫爺爺換上新的花。2012年的端午節，回老家拿東西，小兒子好奇地看著爺爺的遺照，沒有見過孫子的爺爺與沒見過爺爺的孫子，穿越時空的對望。

Text\ 葉英傑 • Photo\ 葉英傑

葉英傑（Bobby）
1984年入行。曾任晶報、文匯報、
香港政經周刊／兒童日報，現職路透社。

錯失時機　遇上意外

為攝協期刊寫想當年的難處是：認識我的行家朋友都知道，我是一個口不停（說和吃）的人。與此同時，我亦經常提醒自己，不要向後輩恃老賣老。從出來工作之初，我一直告訴自己日後不能當老油條。在美其名健談而在這些年體驗真的可以講上一大堆，與自己內心堅持不講古不指指點點這兩者之間，我希望能在這個欄目達致平衡而對大家有所啟發。

「男人過了四十，要做有把握的事。」這句在電影《一代宗師》裏的台詞，套用在我攝影歲月裏，還真感到不實在。直至此刻，我都不覺得自己拍攝時有十足的把握。曾有一段時期，在等待重大人物走下飛機，我的心跳得厲害，相信自己死於心臟病比死於癌症機會大。在採訪前表面上口若懸河的我，面對種種不確定，當時都感到戰戰兢兢，之後如釋重負。出外工作呢？首天或第二天吃必理痛是十分正常的事。

每當被人問到自己最難忘的照片，絕不會想到某一張滿意作品，而是一些拍不好或者拍不到的。翻一下舊照片，在這個半版圖輯裏就有一張。

這一張沒被拍到，非常慚愧。

近年單車運動在大眾普及，一些攝記工餘亦有參與比賽。早在八十年代，香港單車比賽已經活躍。維多利亞公園會用作舉行繞圈賽，我第一次拍攝單車的工作就在維園。1984年初，我是商業攝影師王化人的助手，他從英國挾技返港，成為香港可能是第一個使用300mm f2.8 拍攝人像的攝影師。他受僱拍攝單車比賽也是用300mm，手動對焦快速精準。他聽到車手過了他之後意外倒下，肥胖但靈活的身軀反身一轉，還可拍下車手第一刻痛苦的表情。我呢？拍頭拍尾，大多是不重要，亦沒被使用，技術上亦絕不如他。

第二次拍攝單車就是這個圖輯，1986年7月5日刊登在《晶報》。之前一周，一名泰國籍單車手在公路賽意外身死，成為香港賽事首度的不幸。由於翌日維園舉行繞圈賽，我便前往拍攝，希望藉一組照片紀錄單車比賽的危險性。那個比賽競爭激烈，意外不少。最後一圈，當大家在終點等待車手，卻見香港名手洪松蔭從老遠一手枱著車架，一手拿著一個摔彎了的輪呔走入最後直路。好像當時不少人衝出來看吧，一如多年，我和那時在英文虎報工作的Vincent余偉建站在一起，他伸前拍到了，我反應慢拍不到。

洪松蔭在衝過終點後提著氣喊道：「前面撞得仲嚴重！」

我還來不及細想剛才的失手，即與眾記者由終點狂跑百多公呎，回到最後那個彎位，見到救護員圍著一個倒在地上的車手，我上前舉機拍攝，獲得圖輯右面中間那個影像。忽然被右邊一道重力推開，飛彈到幾尺外，跌在地上。

我半清醒地想從地上爬起來，還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就已聽到Vincent和其他一兩個記者圍著一個人推來推去，大聲喊罵。原來我是被主辦當局一個人員推了出去，不是因為我們走得近，而是在慌亂中不想我們拍攝。記者在和那人員理論。

起來後，我第一時間看看相機性能如何，竟發現兩部連著捲片器的相機都同時摔壞！沒得繼

續拍，氣得半死。至於人們的對罵聲及推我的主角，我都沒有理會，甚至兩手肘在流著血，我都沒有知覺，心仍在為不能拍下去而氣結。

當時好像有人提議報警，但無論如何，爭執最後不了了之，我也沒有參與。只記得一向不愛喝酒的我，最後竟和Vincent走進銅鑼灣一間酒吧，沒多提那個人員，卻在為那兩部壞機而忿忿不平。

那照片，《南華早報》拍到，《英文虎報》拍到，《晶報》拍不到。那些年，英文報章的攝影水平和風格馬首是瞻，一向視它們為衡量自己水平的我，豈不若有所失？

小報薪酬低，但最大的好處是：好些時候都是由自己安排工作，尤其每周的圖輯，由選題、拍攝、編輯、寫稿，沒有人會過問，大致合格就可以，做得出色會獲讚賞。這有點像自僱人士，要多努力悉隨尊便。這是一個極佳的訓練，可以讓記者作多方嘗試。犯了錯呢？就像我這次採訪，圖輯裏少了一張重要的照片，在小報可以承受得起，至於個人是否承受得起是另一問題。對我而言，公司不知又或者知道而沒有出聲，反而令我更為羞愧。

名攝影師David Bernett，即率先用大底機tilt&shift拍體育那一位，曾被問及他最耿耿於懷的採訪時，他說是掛著四部頂級相機，採訪兩個領袖歷史性會面。身上四部機的菲林都剛好拍完，錯過了他們擁抱具決定性的一刻。

如此神話在數碼年代大概不會發生，現在只愁拍得太多。無論如何，攝記兩大忌：錯失時機和人身安全，我在投身新聞攝影初期在同一個採訪中都遇上了。但願是最後一次，尤以後者。就拍攝披頭四拿著枕頭對打的攝影記者Harry Benson說「沒有一張照片值得付出生命去拍」而言，這是實話。見有攝記血流披臉還要換過沒有血漬衣服回港的情景，還不感到心寒？若能取捨，捨前忌而避後忌，大幸矣。

岑允逸（Dustin）

1994年獲香港理工大學攝影設計（榮譽）學士，曾任攝影記者超過十年，現為自由攝影師。曾獲多項紀實攝影獎，包括由香港報業公會、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亞洲傳媒大獎及國際特赦組織等機構舉辦的新聞業界獎項。個人展覽包括「別名：Xianggang」（2003）、「奧運健兒寫真」（2009）及「某座」（2011），曾出版攝影集包括《一人生活》（2007）、及《係・唔係樂園：岑允逸攝影作品》（2008）。並曾參與多個本地及國際攝影聯展，包括影像香港（2008）、香港當代藝術雙年獎（2010）、城市漫遊者—社會紀實攝影（2010）、平遙國際攝影節（2008及2011）、三藩市現代美術館主辦的「PhotographyNow: China, Japan, Korea」（2009），意大利的Savignano SI Fest（2010）、Asolo Art Film Festival（2011）及俄羅斯新西伯利亞當代國際攝影節 “Different Dimension”（2012）等。作品為三藩市現代美術館、香港文化博物館及私人收藏。除個人創作外，他於2013年初創辦攝影展覽空間「The Salt Yard」（www.thesaltyard.hk）。
個人網頁：www.dustinshum.com
個人網誌「攝影豬影像隨筆」：fotopiggie.blogspot.com

油墨的味道，是臭的。

攝影記者協會這一趟出版線上期刊，雖然我還沒很透徹瞭解這本刊物裡的實際內容，但也要為他們說聲勇氣可嘉，因為製作以紀實攝影、報導攝影為主軸的期刊、雜誌，老實說實在吃力不討好。所以這個欄目今趟暫時不會去為大家介紹任何書籍，而是回顧一下一些已停刊的紀實或報導攝影類期刊雜誌，無意去攞景或贈慶，只是希望讀者們明白出版刊物（管她是線上或傳統柯式印刷）純粹是labor of love。

除卻《國家地理雜誌》及同類以地域探索的刊物，又或是已停刊良久的《Life》「生活雜誌」等比較軟性大眾圖片故事刊物外，這類紀實報導攝影刊物都希望與一般主流新聞刊物的編採或版面風格脫鈎，還有一個特點是她們通常是曇花一現，舉上一輩攝影師引為佳話、台灣的經典報導文學雜誌《人間》為例，也不過出版了四年而已，卻出了好些出色的攝影師及文學作家，以往出版平台的確是孕育攝影師獨立創作的最佳途徑。

曾任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圖片編輯的

Colin Jacobson 在九十年代辦過一份名為《Reportage》季刊，其特點是以如本地《明報周刊》等特大紙張幅度，圖片往往用跨頁「出血」的版面形式去印刷，藉此能夠把平常難以在一般報紙雜誌裡看得到的畫面迫力「高清」重現，再加上一些風格化的版面設計，例如只用上紅、黑及白色，帶有點左翼味道的顏色組合，去襯托當時許多還是使用黑白膠卷的古典紀實攝影風格作品，又或是用上相對大號的字體（跟當下流行用那些趕絕長者的微小字體排版風氣是北轍南轅），強調視覺上的衝擊，頗受業界人士歡迎，但未到2000年就停刊了。差不多同期還有一本比利時出版的雙月刊《Themes》，由馬格林（Magnum）圖片社成員John Vink創辦，一樣以大

度印刷，風格上不相伯仲，印刷質量同樣出眾，但奈何只出版了寥寥數期。

九十年代末到千禧年期間美國也出現過一本叫《Doubletake》的雙月刊，是由Duke University裡的Center for Documentary Studies 創辦，編輯方向相對聚焦在美國本土社區的生活文化，強調攝影上的文學性，內容不時夾雜著報導文學或詩詞作品。這類雜誌出版的時候，數碼攝影還未算主流的情況下，所以看得出整份刊物相對少了一份躁動，多了一份冷靜。例如當年轟動全球的紐約「九一一」恐襲，正當大家要磨拳擦掌之際，《Doubletake》出版的特刊卻是出奇的內斂，不販賣悲情之餘，而是著力從後遺症角度去探討事件，例如有一部分是透過一些小朋友繪畫，去憶述當時電子媒體鋪天蓋地報導的情景，另外也有當時大部分美國民眾連國家名字也唸不了的阿富汗裡北部民眾生活紀實，嘗試全方位去填補主流媒體報導的真空的部份。《Doubletake》其實頗受讀者愛載，但一直被資金不足所困擾，當年搖滾巨星Bruce Springsteen甚至曾仗義開小型演唱會為她籌款，但最終也捱不過八年。

到較為近期的有英國的《Foto8》半年刊，以攝影師投稿的作品作為刊物的主要內容。《Foto8》比較獨特之處是她背後有一個附屬畫廊作後盾，這個前稱為Host Gallery（後稱 Foto8 Gallery）的攝影畫廊，一方面有助推廣報導攝影作品，銷售作品收入也可補助支出，再加上網站裡的內容，看來構成了一個不俗的生態圈。《Foto8》上次出版的日期已經是 2011年中，是否已經停刊一直是未知數，但上年年末連畫廊也要宣佈因資金問題要關門了，現時他們只會維持網站的運作，雜誌復刊之日遙遙無期。

這些期刊總是無聲無息的消失，短壽的生命總叫人惋惜，其實出色的攝影師作品、又或是編採人員從來不缺，缺失的大概只有是讀者，或者這些讀者群根本未能豐富到成為一個critical mass的程度，更解釋了往往出版人去辦雜誌是出於熱忱多過商業考慮。也有原因是這種相對硬調子的刊物，要找得廣告客戶並不容易，靠著有限的讀者群，並不足夠去支撐這些追求質量、相對高昂的製作成本。另一方面是一句老話：網絡的興起，以紀實或報導攝影作品為內容的網絡平台大量湧現，由媒體運作或獨立人士編輯的比比皆是，令獨立攝影師發表作品的渠道幾何級數地增多，相信大家有過經驗是，有時候往往同時間在幾個網上平台上碰上某攝影師同一系列的作品。上述提及過幾本追求高質量的影像重現、最快也要雙月才能出版的傳統刊物，比起網上發佈作品的滲透力，又或是在緊貼時勢方面等，始終要輸蝕得多。

《Foto8》的創辦人Jon Levy在自己畫廊徹出宣言裡，不忘感觸地去表達自己對出版事業的鍾愛，強調自己把持的「不是用印刷抗衡數字那一類浪漫的概念，她的挑戰來自要承諾把你（攝影師）的話和圖像用油墨去達成，及去實踐一些在印刷完成後已經不可以再改變的事情，當中所要負上的那份責任。只是因為我們這個行業的風氣已經改變，或者更糟糕的是，因為我們還希望以『群眾外包』（crowd source）的方式令我們的讀者手中獲得事實，並來為我們填寫空隙。

Levy這番話大有壯士斷臂之意，叫自己感慨，因為我也是個一直對傳統印刷有情感上執著的人，卻害怕很多人對書本對印刷品裡油墨味道的浪漫演譯，到過印刷廠監印的人都知道：實情是油墨好臭，多吸是會致癌的。

Text\ 何家達

記元旦遊行 何家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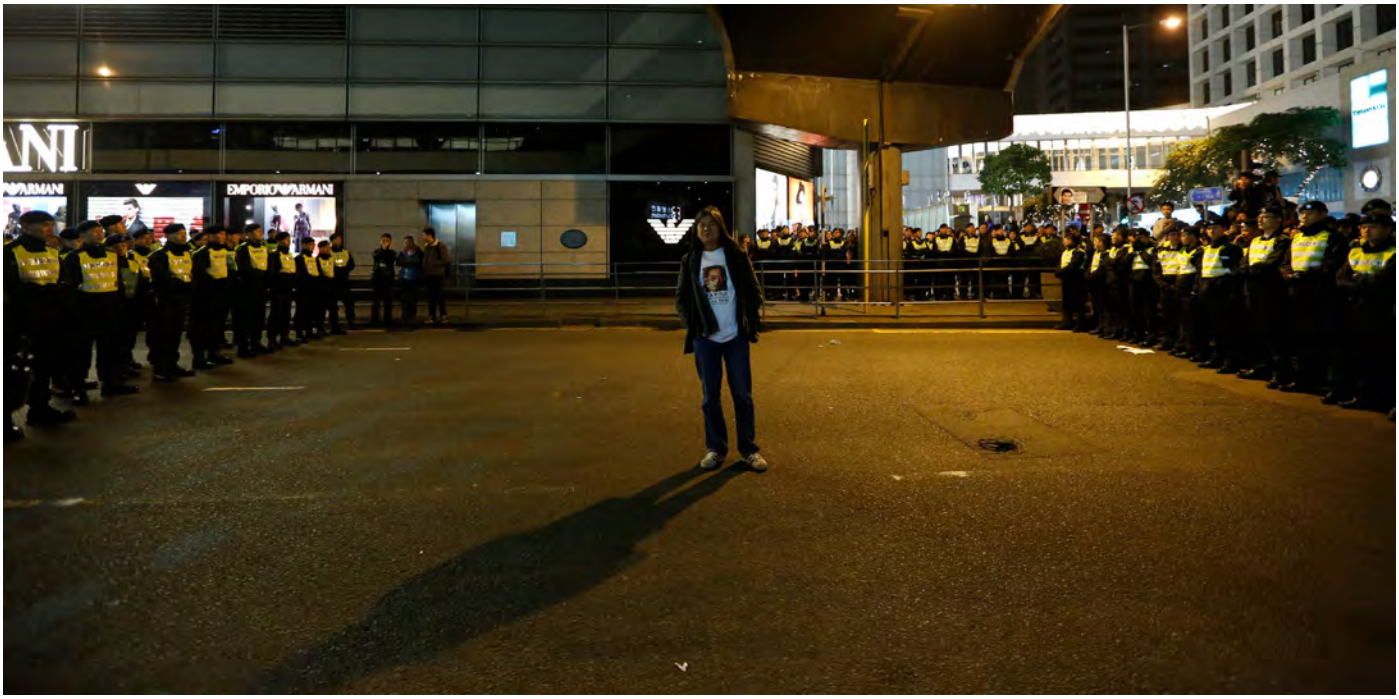
元旦倒梁遊行再有示威者因堵塞中環道路而被警方拘捕，當晚《蘋果日報》在其facebook頁面貼了一張梁國雄被數十名警員包圍的相片，及後即時新聞報導梁國雄被指涉嫌非法集會遭拘捕。該相片迅即被網民瘋傳。大部分網民在轉戴的同時都加上自己的意見或評論，指摘警方無理拘捕，「一個人如何非法集會？」的詰問不絕於耳。

這次事件實為一次很好的新聞攝影課，讓大家重新思考「有相有真相」這句話。無疑，攝影的本質必先是攝影者在真實的事件中觀察並拍下的一個畫面，所以該相片的構成元素必然是真實的。然而，一張來自真實事件的影像能否完全反映真實呢？關鍵在於「完全」這個詞，相片當然能夠反映真實的某一部份，但並不能完全等同真實。

由於讀者往往不能身處新聞現場，故此新聞攝影其中一個基本責任，是以圖片給讀者建構事件之原貌。攝影記者進一步的責任，是從整個事件中綜合觀察，以一至數張照片把事件詮釋出來。假如攝影記者像警察拍攝隊那樣由頭到尾把整個事件的一分一秒都記錄下來，那就不是新聞報導了。報導必然是一個選擇的過程，甚麼該報，甚麼不該報，每間媒體自有不同取向。這個選擇的過程由不同的人操作均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故此一張新聞照片的產生必定是攝影記者經思考後，有意識地、有目的地選擇將某種訊息傳遞給讀者。這一連串的審視、分析、選取、刪減後得出來的相片，是否能達到人們所說的「有相有真相」？

筆者無意在這裡討論政治，到底堵路是否合情，拘捕是否合理並不是這裡討論的重點。但筆者想指出，「警方無理拘捕」這個印象，正是網民在觀看梁國雄「以一敵百」的照片後，加上「非法集會」罪名，這兩種互相矛盾的資訊的合成物。警察在記者會上譴責示威者堵路，但梁國雄則指是警方刻意阻撓示威者前往原定的示威地點，造成堵路，事件頓成羅生門。傳媒報導新聞的時候，至少應肩負起釐清真相這個責任，如何運用新聞照片是傳媒同儕應該思考的問題。

照片的特性是曖昧的，一張照片要滿足新聞學裡的「六何」實非易事，故此新聞照片必須配上適當的圖片說明才是較嚴謹的做法。《蘋果日報》的梁國雄照片最終沒有被刊登，只是在facebook網頁上作即時新聞之用，並配以小題：「畢打街清場 長毛被



帶走」。翌日《明報》轉戴了《蘋果日報》的照片，並配相以下圖片說明：
「大批示威者昨晚在中環與警方對峙，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中）走到警方防線前高呼『梁振英下台』口號，遠處的示威者像合唱團一樣和應，其後『長毛』被指涉非法集會被拘捕。」如此，讀者既能看到一張衝突性強烈的照片，但又能從圖片說明中得知如此有趣的畫面的產生過程與前因後果，不至於讓相片的曖昧性令讀者的想像力肆意亂闖。